



2 020 5635 4

时代的思考

(党员学习材料)

国防大学政治部组织部编

目 录

一个真正牧马人的自述	
——曲啸同志谈理想与追求·····	(1)
在战火中坚定共产主义信念	
——一等功荣立者、某部战士盛其顺·····	(20)
共产党员一定要做好样子	
——国防科工委某基地总体室主任李凤洲·····	(31)
我还是那颗心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校长陶西平·····	(39)
时代的思考	
——刘吉同志就思想政治工作答青年问·····	(62)
祖国·艺术·人生	
——著名画家范曾在南开大学的讲话·····	(84)
只求为人民服务到白头	
——上海海运管理局“长柳”轮服务员杨怀远·····	(96)



一个真正牧马人的自述

——曲啸同志谈理想与追求

《光明日报》编者按：六届全国人大代表、营口市教育学院副院长曲啸，有着和电影《牧马人》主人公相似的经历。他先是被错划为右派，继而被送去劳动教养。“文革”中，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坐牢十余载。他的这篇自述，讲的是他曲折、坎坷的经历，却深蕴着人生的哲理，读来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他在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九年的二十二年间，蒙受了那么大的冤屈，但对党对社会主义祖国不但没有丝毫怨言，反而感情愈益真挚和深厚了。这是为什么？原因在于他有崇高的理想，对共产主义有着坚定的信念，对党和祖国的未来充满着信心。

进行共产主义理想的教育靠抽象空洞的说教不行，需要有具体生动的典型形象，需要榜样的力量。我们希望曲啸同志的这篇自述能成为各地进行理想和道德教育的形象教材，也希望读者在读过这篇文章后认真地作一番思索，并将自己的心得和体会告诉我们。

一个人应该怎样对待自己的青春呢？我想在这里同大家

谈谈我的情况。我出生在旧社会一个贫寒的知识分子家庭。父母只有我一个孩子。我的童年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东北度过的。解放后，是共产党用助学金把我一直培养到大学毕业。通过党的多年教育，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我愿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但是，人生的道路，从来不是笔直的，即使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每个人在生命的旅途中也会遇到许多曲折和不幸。一个人应该怎样对待这一切呢？怎样使自己生活得更有意义呢？我自己的生活经历告诉我，人活着应该有一个信念，有一个理想。我认为，一个人的理想应该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和人民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样的理想，这样的人生追求，才能说是有意义的。

一九五七年，我大学毕业后八天，就被错误地打成“右派”，送去劳动教养。我觉得做人的原则应该是自尊、自重、自爱、自强。如果遇到一点事情就颓废了，那是不应该的。

我是东北师范大学毕业的。一九五七年，我刚毕业八天就赶上了“反右”斗争，被打成了“右派”。一夜之间变成了人民的敌人，我是想不通的。在决定开除我团籍的大会上，让我表态，我说：组织上既决定开除我团籍，我保留意见。我对同学们说，在离开培养我多年的团组织，离开同志们的时候，我心情是沉重的。我希望能若干年后，我们再见面时，彼此能于心无愧地告诉对方：毕业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为祖国做了些什么。我流着眼泪离开了团组

织，也离开了母校。

离校后，我被分配到辽宁新民师范学校。我仍然满腔热情地工作，加之我热爱体育活动，青年朋友们比较愿意和我接近，没想到这又是一条罪状。

有位领导问我：“现在同学管你叫老师，而且愿意接近你？”我说：“对。”他把脸一沉说：你是和我们党争夺青少年。不容分说就将我开除公职，送到凌源县劳动教养。

我打起行李主动到教养院报到去了。我想，到那里去不就是劳动吗？劳动完了，就回来了，其实，不是这么简单。这一进去，可就不能随便出来了。当时是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当时，我们的活儿主要是耙地种稻。虽然我不应该到这里来，但我通过劳动体会到了种稻子并不是容易的事情。经过一段时间的劳动，我们又被调到开原，修清河水库。后又修大坝、建楼房、种地，总之各样的活儿都干过。因为我想着劳动一段时间后还要出去做教师，所以我还坚持学专业。

我觉得，做人的原则应该是自尊、自重、自爱、自强。自尊就是为了人的尊严，不能在任何情况下，轻易丢掉自己的人格。自重就是处理任何问题应该慎重、仔细，不能成为随风倒的墙头草，或无根的浮萍。自爱就是不断地充实自己，丰富自己，使自己的身心保持健康。自强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人应该自强不息，一个青年人应该有一种决心，用自己的劳动在人类的文明史上刻下一道痕迹，对后代人有所教益。这是我生命的真正价值。如果遇到一点事情就颓废了，悲观了，甚至走上绝路，那是不应该的。

一九六一年十月，我被摘掉了“右派”帽子，解除了劳动教养。被打成“右派”那年，妻离子散，现在，我告别了母亲，孤身一人来到兴安岭脚下一个新开辟的农场安了身。从此，我成了牧马人。

我把巴甫洛夫的名言“原谅自己，就是堕落的开始”，写成条幅，贴在墙上。由于我的表现好，一九六一年十月一日就被摘掉了“右派”帽子，解除了劳动教养。

我是一九五六年结婚的。可我成了“右派”后，曾经和我“海誓山盟”的妻子向我提出了离婚，我感到很突然。但我又想，没什么，大丈夫何患无妻，既然不能给你幸福，我还你自由。我们有一个刚出生的孩子，我想要，可法院的同志说：“你是右派，要什么孩子？”这样我妻离子散了。摘了帽子后，我满怀希望地走向新的生活道路，可社会上的一些事使我很痛心。我想教书，可没有一个学校要我，一听说是右派，人人都避而远之。我曾偷偷地去看孩子，可托儿所的阿姨对我说：“这孩子的爹是右派、反革命，死了。”我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心想：人们说我已死了，孩子才四岁，不要因我而受牵连。我忍痛没暴露身份，怅然离开了托儿所。

我的母亲希望我能留在身边，可我哪能靠母亲来养活呢！我要自己劳动。邻居们向我投来白眼，比拿鞭子抽我还难受，这使我感到，家乡不能呆了，只好走。于是我告别母亲，离开了家乡，来到兴安岭脚下一个新开辟的农场安了身。农场让我养马，从此我成了牧马人。

我是学心理学的。我根据心理学的一些原理来驯养马。

看到我驯养的马能够犁地了，驾车了，心情很激动，我终于能用自己的劳动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了。我渐渐地和马有了感情，春节时我写了副对联，贴在马圈。上联是“为放马战槽头哪怕披星戴月”；下联是“垦荒地种五谷何惧宿露餐霜”；横批是“乐在其中”。

驯马一段时间，我又被选拔当了小学教师。后来，由于我这样的人“不适宜在边疆工作”，又被迁到辽宁，在一个劳改农场小学教书，并同当地一位农村姑娘成亲。

没想到，对联被传扬开了。一位领导找到我说：“听说你是大学生？”我说：“是啊。”他问：“你能不能教书？”我说：“我就是师范大学毕业的。”他说：“那好，咱们大草原有十多个孩子，你教他们吧。”我说：“我是右派身份，恐怕不合适。”他说：“没关系，咱们这里山高皇帝远，能教就教吧。”他很坦率地又说了一句，“你别说错了就行。”从此我做了教师。学校的条件比较简陋，放马住的茅草房是教室；找了些木板一钉，高点儿的是课桌，低点儿的的就是板凳；用块铁皮涂上墨汁，就是黑板。开学时，来了十三个小孩，根据实际程度，分了五个年级。学校条件虽简陋，上课却很正规，我一个人教这五个年级的课，是很辛苦的。除了课堂上课外，我还领孩子们到野外去上课。在我们地区学校的统一考试中，我教的班取得了平均九十八分的成绩。

后来，我又被迁到辽宁，因为象我这样的人“不适于在边疆工作”。于是我又在一个劳改农场教小学二年级。这一

年我工作积极，同志们选我为优秀教师，可领导不批，说：“右派不能当先进工作者。”不是摘帽子了吗？“摘了帽似乎也不行。”言外之意是摘了帽也是右派。

在这里许多同志关心我，建议我成家。我想，谁家的姑娘愿意找一个右派！我对此也不积极。后来，一位老司机愿意把他的侄女介绍给我。这个姑娘条件很好，论家庭出身，是贫农的女儿，父亲是土改时入党的老共产党员，是农村的生产队长。她自己是妇女队长，还是共青团员，比我小十来岁。我觉得我配不上人家。后来，这位老司机把侄女叫到了我们农场，我们见了面。她是一个典型的农村姑娘，很美丽。我如实地介绍了我自己，特别在说到我是右派时，我还加重了语气，谁知她并没害怕，说：“我听叔叔说了。你不是故意当右派的。”我一听，这话真是有份量，谁还会故意当右派？这么多年，谁也没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只听到什么“根深蒂固的、由来已久的，只有脱胎换骨才能重新做人。”这姑娘说了这句话，真是“良言一句三冬暖”啊！我心里一热乎，就同意和她结婚。我们当时订了三条：第一孝敬父母；第二不吵架；第三不能轻易离婚。姑娘一分钱的彩礼也不要，我非常感动，就把我的旧表给了她，可她还是要。我想总要有个纪念品才好，我给她买了双鞋。第二天我们就去登记，第三天就成亲了。

我们结婚时，既没有隆重的仪式，也没有丰盛的酒宴，连一个来宾也没有。我们的新房很简陋，用几张桌子搭成了床，唯一的家具是我劳动教养时用过的书箱。我身上只有十一元钱，她只有五元钱，买了一个饭锅，就花了七元多。虽然物质条件不好，但是真正的爱情不是物质条件换来的。第

二年，我们生了个胖小子。

“文化大革命”开始，一夜之间我又变成了“牛鬼蛇神”，批斗会昼夜不断，最后被定为所谓的“现行反革命”，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可是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夜之间我又变成了“牛鬼蛇神”，批斗会昼夜不断，家也被抄了。

我的罪名越来越多，说我向学生散布反动言论，思想极端反动，图谋不轨。怎么回事？原来，“文革”前有一天晚上，我正在教室批改作业，突然进来一个女学生说找我谈一谈。我并不认识她，问她是那个班的，她说是中学部三年级的。我是小学老师，不认识这个学生。她说因为她父亲犯过罪，思想上有包袱，应该怎么解决？我说，“你父亲有罪不等于你有罪，周总理说过：家庭出身不能选择，个人前途可以选择。你应该做革命的接班人。”我还举了一个例子，说：旧社会能上大学的劳动人民家庭子弟不多，所以解放初期，北京的大学生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家庭的约占百分之八十，共产党对这些人都是一视同仁的，你不必悲观。

可是在批斗会上，这个女同学的班主任拿着检举信，说我进行反革命串连，见到家庭有问题的学生就往身边拉拢；说我散布全国地富反坏右占百分之八十，而且让那个女孩子接反革命的班，千万别接革命的班。我当然不承认，别人就用皮带打我。到后来给我平反时，法院在沈阳找到了这个女孩子，她出证说：那次找曲啸谈话是班主任老师派我去的，而且说是党交给的任务，并且整了个材料让我抄，让我签了字。这个假案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

批斗会上挨打是很厉害的。记得一次批斗会上，有位专政队长看我不说话，就喊“负隅（隅）顽抗！”我当时出于教师的本能说了句：“那个字念‘隅’。”这下可坏了，招来一顿棍棒。他们说：“革命群众念错一个字，你就恨之入骨，你反动透顶！”

批斗会越开越频繁，最后我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我和亲人在哭声中分手了。专政队强行发给了我一份所谓“离婚证明书”。我爱人和孩子被赶到乡下，生活处于绝境。后来，我母亲也死了。

一天，我爱人带着孩子，扶着婆母到监狱看我。我面对着一家老小，真是心如刀绞。我母亲把她的一床褥子给了我，说：我岁数大了，这次入狱，我怕见不着你了，以后想起妈妈，你铺上褥子就象看到我一样。

我爱人从身上脱下一件棉背心给我披上，那时是十一月底了。孩子不懂事，刚会叫爸爸，他一边摸着手铐一边问：“爸！啥？啥？”我怎么能告诉孩子这是关系到我们一家人生死存亡的手铐呢！当时，我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对爱人说：“玉兰，我们离婚吧。”我爱人听我这样一说就哭了。她说：“为什么你要赶我走呢，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我说：“不是我们感情不好，当初你不嫌弃我是‘右派’和我结婚，我一辈子都感谢你。可现在我被判了二十年徒刑，你才二十几岁，怎么可以因为我而断送你的一生呢。”爱人坚决不同意，说：“我自己能劳动，我等你回来。”我又说：“为了孩子你不要等我了，你不能让我们的孩子当一

辈子‘反革命子弟’。如果你珍惜我们的感情，你就答应我的要求：第一，母亲死后，替我把母亲埋了；第二，希望把孩子带大，等他长大成人后，再把我的事情告诉他；第三，你生活实在困难，你一定和一个朴实的农民结婚，这就算对得起我了。”就这样我们在哭声中分手了。后来专政队强行发给了我一份所谓“离婚证明书。”以后我才知道，我进狱后，专政队把我爱人和孩子都赶到了乡下，而且不让我的母亲和我的爱人在一起。母亲回到了家乡，我爱人和孩子被赶回了娘家。更为狠毒的是，把判我徒刑的大布告贴到了岳父的家门口，老岳父受不了这种打击，得了重病。大妻弟也因为舆论的压力得病死了。二妻弟是部队副连长，也因为受我的株连，转业了。许多亲戚受了株连。我爱人和孩子由于生活不下去，不得不到山海关北边一个山沟里找一个远房姨母躲一躲，求个生存。后来这位姨母也死了，我爱人又得了重病，孩子也有了病，娘俩处于生活的绝境。从此，我和他们也断了音讯。后来母亲也死了。

在狱中，我读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感到“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事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它完全是一种邪恶势力借党的名义制造的一场灾难。而且，这种邪恶的势力是不会长久的，党迟早要恢复自己的威望，我的问题总会解决的。因此，我利用同罪犯在一起生活的机会，收集资料，准备将来研究罪犯心理学。

在监狱中睡不着觉时，我曾认真地思索：曲啸，你到底是不是反革命？我自己的回答是否定的。我回想着我走过的历程，旧社会我的家庭很苦；我整个童年都是在帝国主义统

治下，过着亡国奴的生活。一九四六年，我们那里来了八路军，才解放了，当时我是中学生。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七年，在黑龙江省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县委把我们学生干部抽调出来参加了土改。我亲眼看到千千万万贫苦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向吃人的封建制度进行斗争时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力量。我看到了劳动人民翻身解放后，分到了土地房屋时对党表现出的爱戴之情。我认识到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劳动人民是不能翻身解放而成为国家主人的。所以，我是拥护党、热爱党的。那时，我就想，长大以后也要做一个共产党员，也要做个八路军。我是在一九五〇年入团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共青团员，当时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父亲死后，我家的生活特别困难，那时我在大连高中念书，我在学校里半工半读，后来考进全公费的师范大学学习。一九五七年我受到了一些冤枉，可我内心对党的感情没有变，我相信有一天党总会了解我对她的忠诚。可为什么越想跟党走，罪名越大，最后成了反革命？这就使我不得不重新考虑一些问题。母亲死后，我把在狱中赚的钱买了许多书，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毛泽东选集》等，我要看一看我原来的信仰是错还是对。我还要看一看，我面临的现实是怎么回事。我还要想一想，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里有哪些能说明我是无罪的。这时，我感到“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事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宣言》里有一句话：“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的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那就是说共产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绝不是以压迫劳动人民为其目的，正相反，她是以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为目的的。而“文化大革命”使许多老百姓、知识分子

党员和党的干部，特别是老干部都受到摧残，难道这是我们共产党的本质所决定的吗？不是。这完全是一种邪恶势力借党的名义所制造的一场灾难。而且，这种邪恶的势力，是不会长久的。迟早党要恢复自己的威望。

这时，我想，我的问题总会解决的。所以我决定在任何情况下绝不做一件违背人民利益的事情。

我时常想，在我国没有研究犯罪心理学的人，心理学家很少有可能和罪犯在一起生活，所以不容易研究。如果我能和各种各样的罪犯在一起生活二十年，那我是很有条件研究罪犯心理学的。等我出狱后写几本这方面的书，把它献给司法和教育部门，也是为人民做贡献。我开始有意识地收集周围罪犯的心理资料。这为我平反之后完成罪犯心理方面的写作任务提供了条件。去年我和一些专家写了一本《青少年罪犯心理学》，四十万字，今年可望出版。我自己写的《罪犯心理及其对策》，三十万字，还没有脱稿。另外我还写了一些关于罪犯心理方面的论文。

“四人帮”垮台后，监狱的情况也有了改变。有一天演了电影《延河战火》，反映保卫延安的战役，这说明对彭德怀同志会有新的结论了。这是一个新的信息。

后来，监狱中广播了《洪湖水浪打浪》，我心里非常高兴，想到贺龙元帅也要平反了，想到彭德怀一样了，我也要向党申诉了。我用三天的时间，写了五十页上诉状。我对人民政府的第一项要求就是允许我和预审员见一次面。因为我被判刑这么多年还没见过预审员的面，也没见过判决书。后来找来判决书一看，上面写着：在审讯过程中，拒不交待问题，负隅顽抗，坚持反动立场，狡辩抵赖，必须予以重

判。此认定构成现行反革命犯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我向政府提出问题，有哪一位司法人员在什么地点，什么时间，问过我哪一个问题，我没有回答？如果没有，我就不能承认犯罪。政府一看，是啊，没有经过预审，怎么能判二十年呢？最后，组织一调查，确实找不到审判员，而判决书上盖的是军管会的章。所以，没有法制，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就无法得到保障。

一九七九年一月，我的冤案终于获得平反。我怎能不从内心喊一声：党啊，你真是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的母亲！尽管自己这些年来的遭遇是很不幸的，但我想，我们的党不是也同样地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吗？所以我没有向组织上提任何要求，组织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工作完全服从组织分配。一九八二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日，监狱的门打开了，一位看守员含着微笑叫我去一间屋子。我进去一看，有许多同志，其中一位对我说，法院接到了你的申诉，现把复查的结论告诉你：一、撤销原判决，二、无罪释放，立刻返回单位。我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十二个年头啊，我象在一个荒原上被暴风雨吹打的婴儿盼望着母亲那样盼望着党的到来，解决我的冤案，今天终于盼来了，我怎么能不从内心喊一声：党啊，你真是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的母亲！

我换了一套新衣裳，我们单位的政治部主任王宗昌拉着我的手说，曲啸同志你受委屈了，党委派我来接你回去，咱们马上回家。

当我听到他叫我“同志”时，我再也忍不住自己的眼泪

了。“同志”这个词，对于一般的人来讲，也许不以为贵，但是，这个称呼对于一个失去了这个称呼又重新获得了它的人来讲，比生命还宝贵。二十多年来，我没有资格叫别人“同志”，我也没有资格被人叫“同志”。今天党委的领导同志拉着我的手叫我“同志”，而且说我受委屈了，这种温暖只有被解放的人才能体会到。不久，我又接到东北师范大学来的通知：“一九五七年给你的右派结论，经复查确属错划，予以纠正，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团籍。”没想到我在四十八岁时又戴上了共青团团徽。以后办了离团手续，许多年轻的同志欢送我，给我说了许多热情洋溢的话。四月十五日，我又接到一个通知，说一九五八年送你劳动教养是错误的，撤销处分，恢复政治名誉。通知上问我有什么要求，我想，我们知识分子除去要求党的信任，把自己的才智献给祖国，还能有什么要求呢？如果一定要我提的话，那我只有一个要求，请党组织严格审查我在蒙受冤案二十二年的生活中，特别是两度蹲狱的十六年凄惨处境的情况，如果确认我对党没有一句怨言，没做一件违背人民利益的事情的话，请接收我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来，党组织根据我的要求，终于在一九八二年接收我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我觉得象我这样经历过严重挫折，特别是在十年动乱里受过不幸迫害的人，面前确实存在如何正确地对待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问题，正确地对待别人和自己的问题。尽管自己这些年来遭遇是很不幸的，但是我想，我们的党不是也同样地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吗？如果我把我的损失看作资本，把手伸出来向党要这要那，那我们党所受的损失向谁要赔偿呢？同样遭了一场大病，又有哪个儿女向父母要补偿呢？所以我在平反以后没有

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工作完全服从组织的分配。另外还有一个和一些人“解疙瘩”的问题。比如说，我平反以后，见到了整我的那位老兄，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入了党，又提了干，那真是春风得意啊！他见了我以后，憋了半天憋不出个词来。我说，你是不是想说“对不起”呀？我想，你连承认错误的勇气都没有，“对不起”三个字都不能坦率地说出口，让我跟你说什么呢？我对他说：你放心，我决不以牙还牙。咱们有劲往工作上使，我还要跟你比赛一下。

我身上确实有用不完的力量。我经常向同志们讲，要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爱的本质是给予而不是获得。如果你热爱党，那就应该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这才叫真诚的爱。

我今年已五十四岁了。平反之后，我觉得我身上确实有用不完的力量。我经常向同志们讲，要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有一次我问一个大学生：爱的本质是什么？那个大学生想了一会儿说，爱的本质就是好呗。我说不是这样。我认为爱的本质是给予，而不是获得。衡量一个人的所爱，就要看他能不能无私地把他的一切献给他所爱的对象。如果你热爱党的话，那就应该无私地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在祖国需要的时候把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都无私地献给她。这才叫真诚的爱。如果不是这样，总怀着个人的打算，或者存在某些不正当的企图，这种爱是不纯的，也不真，同样也不会深，不可能经得住严峻的考验。

另外，青年男女在处理爱情的问题上也有一个给予还是获得的问题。有一次我们营口的婚姻介绍所的同志来找我，

问我能不能给讲讲恋爱心理。我翻了一下登记表，很有意思，有的小伙子的条件就两个字：漂亮。我当时就想，这两个字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在爱的问题上，他只想获得，而没想到给予。获得什么呢？获得漂亮。可是你想过没想过，一个漂亮的女孩子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苍老了呀。到她头发白了，牙掉了，腮帮子也瘪了的时候，还漂亮吗？那个时候你还爱不爱她呢？所以你这个条件是不对的，光想到获得，没想到给予，你还不真正懂得爱情。如果真正想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献给对方，而对方也一样的话，那么夫妻俩一定会很恩爱的，我对爱情就是这样理解的。

一九八一年，我被调到营口教育学院工作。我一面把在监狱里积攒的材料写了一些书，一面教《心理学》，任务比较重，有时一周要上二十四节课。对调工资，调整住房，我总是先人后己，尽量让给最困难的同志。因为我们党员有一条规矩：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平反以后，我开始在劳改农场工作，一九八一年调到了营口教育学院，在这几年里，我一方面把我在监狱里积攒的材料写了一些书，另一方面还教心理学，任务是比较重的，有时一周要上二十四节课，比规定的要多得多。那么这些超额的工作量有没有酬金呢？一分钱也没有。我照样拿六十八块五的工资。因为学院里没有钱，不光我这样，大家都是这样做的。对这一点，同志们都想得通。现在青黄不接，教师力量跟不上，特别是心理学教师，更是少得很。党把承上启下的任务交给了我们这些中年知识分子，我们不干谁干？人民教我以知识，我还知识于人民。工资的问题也是这样。我